

中国学术史新证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廖名春◎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B2-53/15

2005

中国学术史新证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廖名春◎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 静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丁 丁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史新证 / 廖名春著.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6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
ISBN 7-5614-3098-1

I. 中... II. 廖...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4718 号

书名 中国学术史新证

作 者 廖名春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mm×202 mm
印 张 18.125
字 数 411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2 001~4 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序

唐代刘知几认为，学人当兼具才、学、识三长，然后可言治史。才指天赋资质，学指学术素养，至于刘氏所最看重的识，是否即指某种洞幽烛微、发覆起翫的理性思维能力呢？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据《新唐书》卷132之本传，刘知几“领国史且三十年。礼部尚书郑惟忠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榱桷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惧，此为无可加者。”

刘氏所谓识，原来是指史家对于自己所从事工作之价值诉求的主观自觉，以及承担实践这一自觉的智慧和勇气。这种定义在知识学意义上能否成立，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也无须多加讨论，但就其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这一点，应该说确有所见，至少在人文学科领域，今天已成共识。按照公羊学的观点，孔子正是出于对“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现实深感忧虑，才笔削《春秋》，“使乱臣贼子惧”。这种实践是刘氏三才说之所本，而孔子“为万世立法”说的成立，更证明刘氏对“识”的阐述无论在知识学或者价值论层面都自有其合法性。

仅就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言，刘氏之“识”在今天有两点启发值得予以重视：其一是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历史文本首先应作为一个蕴含有文化意义的事件来加以解读，同时应当设身处地，“对古人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诣表一理解之同情”；其二是将自己的研究视为由该文化所凝结之个体对此精神实体的反思、传承和再创造，如陈寅恪诗“吾侪所学关天意”之所揭橥者。为什么陈氏能够对王国维的自沉做出不同于流俗的说明？其对隋唐政治、文化的研究又为什么能在贡献和影响方面超迈同侪？就因为他是—位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的中华文化“托命人”，舍乎此又岂有它哉！

完全不必拉什么名角出来为廖名春站台造势，我确实认为在当代治国学的同辈学人中廖名春的成绩应该是相对最为突出的，并且我也确实相信其所以有此表现，主要在于其对古圣先贤之文心情怀深有所契。换言之，即对刘知几三才说中的识有所体悟。这种判定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首先，他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锁定在对经学的释证上。学术分工本无高低贵贱可言，对今天的学人来说，研析经史子集或者别的什么，多半都是出于误打误撞的外在偶然。廖名春不是。他硕士读的是训诂，但他并不满足于在章黄门下游走，而是力争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楼。他曾跟我说起，在追随金景芳先生做博士论文后，思想上有一觉悟，自此确定了自己的治学方向。他曾一度参与陈鼓应先生《道家文化研究》的编纂工作，在刊物上以发表关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的整理成果而为学界瞩目。后来，就是因为在对《易传》的学派归属性上与持道家文化主干说的陈氏不合，终至与之分道扬镳。拈示这点，不是要评论学术是非，而是想表明廖名春的学术立场坚定，有种“护道”的

自觉。“从语言到历史，以考据求义理”，反映的既是其问学次第，也是其心路历程。

其次，他对经学的正面理解或肯定态度——这恐怕是其受惠于金老先生之最关键处。他认为经之所以为经是由于它们所记载的是先圣之道。这种先圣之道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因其为全社会所认可接受，构成了维系整个社会正常运作的基本支撑，因而是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根。这种理解在以前是常识，在今天却是洞见，因为“五四”以来的主流思潮倾向于对传统价值的否定。近代经学大家周予同先生其毕生所致力者，即“要把经学那纸糊的高帽子撕破给人看”！

最后，我隐约感到廖名春有一种“周文既没，文不在兹乎”的担待或气概。由于办《原道》的缘故，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诸如怎样振兴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克服近代形成的对儒学的偏见这样一些问题。本书中对古史辨学派的清理就是这种讨论的结果。近来他又对国内学界传统研究中的西方汉学化（sinologization）倾向愈演愈烈之势十分担忧，拟对20世纪经学精神没落在学术文化研究上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清理。我们筹划着在《原道》上刊发一个类似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先生五十年代所撰的那种“宣言”，表达我们对于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由他来撰写第一篇。

可以说当代学者中才高八斗的人很多，学富五车的人也不少，但是，才、学、识三长兼具者却是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的情形也仍跟郑惟忠当时所见到的一样，文士多而史才少。这多少有些叫人唏嘘慨叹。其实，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其所具有的才华也就会发挥得越充分，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就越能传之久远。我衷心希望我们这辈学人能够将自己的知识、智慧与中华文

化建设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时代。在经历了百年忧患之后，我们的民族再也不容有失！尽管并不是亨廷顿那样的“文明冲突论”者，但我相信，一个民族的复兴，虽然并不以文化的复兴为全部内涵，但却绝对是以文化的复兴为其最高象征。

当然，我也希望自己在这篇序言中所表述的对廖名春其人其学的理解，多少能够为本书的读者诸君之阅读经验所印证。

谨以此为序。

陈 明

2000 年 5 月

前 言

本书是我的一个论文集，因内容不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范围，且大多是以新材料为契机对传统问题重加探讨，故名为《中国学术史新证》。共收入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3 年的论文 30 篇，分为四编。这些论作，都曾发表于海内外各刊物，这次收入论文集，从体例到内容，都做了一定的修改，有心的读者可以跟原作对读。

第一编“经学编”，重点探讨“六经”次序、“六经”并称的时间、“仁”字的本文、“慎独”、“慎德”以及研究经学的方法论问题，共收入论文 6 篇。

《“六经”次序探源》写于 1998 年秋。此文曾在 1999 年 10 月北京“纪念孔子诞辰 2550 周年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上发表，后刊于《历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论文对“以《诗》为首”和“用《易》居前”的两种“六经”次序这一古老的经学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以《诗》为首”的“六经”次序，并非出于今文家；而“用《易》居前”的“六经”次序，虽然出自古文家，但也渊源有自。《易》居《诗》、《书》、《礼》、《乐》之前或居《诗》、《书》、《礼》、《乐》之后，这两种“六经”次序的形成，实与孔子晚年前后经学思想的变化密切相关。陆德明“用《易》居前”本于“著述早晚”，周予同“以《诗》为首”

“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的论断，文献尚难以坐实。从帛书《要》篇提供的线索看，是孔子晚年以前轻视《周易》，所以殿《易》于《诗》、《书》、《礼》、《乐》之后；晚年以后重《易》而轻《诗》、《书》、《礼》、《乐》，所以冠《易》于《诗》、《书》、《礼》、《乐》之前。

《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也写于1998年秋，后刊于《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论文利用新出的郭店楚简印证帛书《要》篇和传统文献的记载，认为六经的形成，源于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并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并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执著于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面对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大量事实，应该反省、检讨自己，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从自己的史观上去寻找问题。

《“仁”字探原》写于2000年，后刊于《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该文认为“仁”的本字当从人从心，作“忞”。后来“人”与“身”通用，就写作了“忞”；“身”形讹为“千”，就写作了“忞”。“忞”亦作“忞”，或者从人未变，而“心”却简省为“=”，则变成了从人从=。许慎《说文》将简省符号“=”误释成“二”，于是从人从=就变成了从人从二，“忞（忞）”就变成了“仁”。“忞”从人从心，当是会心中有人之意。此“人”当是指一般性的人，特别是指他人。心中有人，也就是爱人，这就是“忞（仁）”之本义。

《“慎独”本义新证》写于2001年，2002年11月发表于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宋代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刊于

《学术月刊》2004年第8期。该文认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说是错误的，王念孙以及今人据简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也不可信。传世文献也好，出土简帛也好，“慎独”之“慎”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慎德”说初探》写于2002年春季，是我参加2002年6月底台湾大学“东亚文化圈形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该文认为“慎德”的本义是重德、宝德、贵德，而不应是什么“谨慎德行”或“诚勉其德”。“明德”、“敬德”义近于“慎德”，都是重德说的不同表述。讲西周思想，讲周人重德，应该重视“慎德”说。

《散论三则》收入我3篇短文。《90年代的经学问题》是2000年4月应陈明之约而写，后被陈明并入他的一篇文章中，以两人的名义刊于《原道》第8期。《关于“批判继承”说的思考》写于1998年，后以《积极继承与“批判继承”》之名刊于《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15日第11版《文史天地》栏。《国学研究三题》本是参加北京语言学院一个国学研究会议的发言，《中国文化研究》本来已出清样，不想被《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25日第9版“文史天地”栏抢先刊出，使我有负于人。这三篇小文谈的都是一般性的问题，都与经学有关，故合在一起，聊充一篇之数。

第二编“疑古编”，重点探讨疑古学派的一些个案及其认识问题，收入论文6篇。

《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是我1995夏天参加“纪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后刊于《原道》第3辑和《汉学研究》第16卷第1期。论文依据新出文献和近年来古文献研究的新成果，对梁启超先生颇具影

响的古书辨伪方法进行了分析、平议，认为梁先生关于古书辨伪方法的论述，从观点到论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简单地袭用梁氏的方法去判定古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往往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是1996年之作，发表于《原道》第4辑。论文认为古史辨运动的兴起有日本汉学的背景，即使从政治层面上来评价古史辨运动，我们也不能只对它作正面的肯定。

《钱穆与疑古学派》是1995年夏为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纪念钱穆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而写，后刊于《钱案四先生百龄纪念会学术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术集刊第14期，2003）。该文认为钱穆先生与疑古学派有过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接受过疑古学派的影响，其论著也不乏疑古之作；另一方面，他又是疑古学派的一位批评者，这种批评，愈到晚年，愈趋严厉。钱先生对疑古学派由同情转为批评，对于中国古史研究和古代文献研究，对中国文化的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钱穆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是2003年11月1日参加台湾东吴大学“钱穆思想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后刊于《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该文认为中国学者最早系统论证孔子与《周易》无涉的当为钱穆先生。但在此之前，日本学者本田成之早已有此说。因此，不能说这一著名的疑古论点没有日本汉学的影响。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记载来看，否定孔子与《周易》经、传有关显然不能成立。

《试论冯友兰的“释古”》本是我1995年10月在清华大学“纪念冯友兰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1999年11月底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后刊于2000年6月的《原道》第6辑。论文系统考察了冯友兰“释古”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与王国

维“证古”的关系，认为冯友兰的“释古”与“信古”、“疑古”并非同类的问题，不能与“信古”、“疑古”相提并论；冯友兰的“释古”较胡适的“疑古”疑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现行的中国哲学史排队的错误，主要是由冯友兰系统完成的；冯友兰的“释古”与王国维的“证古”对待“历史旧说”的态度基本不同，王国维是在基本肯定“历史旧说”的前提下，以“地下之新材料”对“历史旧说”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冯友兰“释古”的基本倾向还是疑古。因此，不能高估冯友兰“释古”说的意义。郭沂在《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上著有《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一文，可以对读。

《短论两篇》一是《疑古与史料审查》，刊于《中州学刊》2000年第2期；二是《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史的重写》，刊于《文艺研究》2000年第3期，后又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转发。这两篇短文都是1999年12月参加北京广播学院“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言的副产品，因都是从古代文学史史料的角度谈对疑古派的认识，故合二为一。

第三编“考信编”共收入8篇论文，涉及面较广，从夏代谈到现代，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考辨历史事实的真相，故名为“考信”。

《“仲康日食”考信》写于1998年冬，是参加国家“九五”重点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作，后刊于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的《人文论丛》2000卷。该文认为文献关于“仲康日食”的记载是可信的，其时间当从今本《竹书纪年》，定在仲康五年；具体的月日，今本《竹书纪年》和《左传》的记载难以遽定是非，当以日全食的计算而定。

《竹简本篇〈庄子·盗跖〉篇管窥》写于1994年，后刊于清

华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3 月出版的《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该文认为竹简本《盗跖》篇的篇名“跖”系“𧇧”字之误，而“𧇧”即蹠字，又作跖；竹简本《盗跖》篇只包含今本《盗跖》篇的第一章，这当为《盗跖》篇的原貌。由此可知，《庄子》一书至少在西汉初年就已成形。

《宋玉散体赋韵读时代考》作于 1991 年夏，后刊于《古汉语研究》1993 年第 2 期。该文通过对宋玉散体赋韵读的穷尽性分析，认为《文选》所出《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古文苑》所出之《大言》、《小言》、《讽赋》、《钓赋》八篇的用韵没有不合周秦韵之处。《登徒子好色赋》应为西汉以前的作品，《风赋》、《高唐赋》至少应是东汉以前的作品，《大言赋》、《小言赋》、《钓赋》至少应是三国以前的作品。由此看，这些赋为宋玉所作的传统说法是难以否定的。而《笛赋》、《舞赋》应作于三国以前，但不会早于东汉。《笛赋》最可能作于东汉初至公元 2 世纪初的近百年间，《舞赋》作于东汉傅毅之说是可信的。我们应该将这两篇赋从宋玉赋作中排除出去。

《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词管窥》刊《古汉语研究》1990 年第 1 期，《吐鲁番出土文书新兴量词考》刊《敦煌研究》1990 年第 2 期，《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看“浊上变去”》刊《古汉语研究》1989 年第 1 期，《吐鲁番出土文书别字异文与魏氏初唐时期高昌方音之声母》刊《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 年增刊，《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别字异文与魏氏初唐时期高昌方音之韵母》刊《古汉语研究》1992 年第 2 期。这 5 篇论文，皆出自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词管窥》。1985 年秋至 1987 年夏我在武汉大学古籍所从周大璞先生、宗福邦先生等治古典文献学，选定吐鲁番出土文书做语言研究，可以说是从没人做过的

事。我硬着头皮做了下来，居然也作出了一些成果。这几篇论文从吐鲁番出土文书这一特定角度探索中古汉语的词汇、语法、音韵，颇多新见。这些年来，尽管我已远离了这一领域，但还经常有师友论及。回头审视，虽难免欠成熟之处，但敝帚自珍，我还是把它们收入集中。

第四编“荀学编”是关于荀子研究的一组论文，共 10 篇。我 1986 年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时听李德永先生讲荀子研究，就对荀子其人其书发生了兴趣，写了《试论章太炎的尊荀》、《荀子大儒“法先王”证》、《荀子认识过程论发微》诸文，先后刊于《武汉大学学报》、《贵州社会科学》、《湖湘论坛》。1989 年在吉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金景芳先生指导我作博士学位论文《荀子新探》。我于 1992 年 6 月通过论文答辩，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荀子新探》也由台北文津出版社于 1994 年出版，1996 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本编的 10 篇论文，可以说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主干。

《〈荀子〉各篇写作时代考》写于 1991 年，后刊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该文将荀子的著作大致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公元前 286 年游学于齐前的作品，可考定的有《不苟》篇；二是公元前 279 年以后至公元前 255 年以前荀子在稷下的作品，它们是《王霸》、《王制》、《正论》、《天论》、《劝学》、《修身》，还可加上《解蔽》、《荣辱》、《正名》、《性恶》、《礼论》、《乐论》；三是荀子公元前 255 年以后居于兰陵时的作品，它们是《非相》、《臣道》、《君道》、《非十二子》、《成相》、《赋》，还可加上《富国》、《致土》、《君子》。认为《议兵》、《强国》、《儒效》反映的都是荀子公元前 255 年以前之事；《大略》反映的则各个时期都有；《仲尼》篇的前半篇反映的可能是其在

稷下时的思想，后半篇反映的可能是其在兰陵时的思想。循着这一线索，可大致考察出荀子一生思想发展演变的进程。

《荀子议兵时间考》也写于1991年，刊于《管子学刊》1993年第4期。该文考察了前贤今人关于荀子议兵时间的种种说法，以为都有所不通，考证的结果是荀子议兵应在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57年之间。

《荀子〈正名〉篇性论发微》也写于1991年，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94年第2期。该文认为《正名》虽然不是荀子人性学说的专论，但荀子在这里却揭示了人性的生物前提、人性的基本特征、属于人性范围的概念系统、性和伪的区别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前由于训诂和认识上的一些原因，人们对《荀子·正名》篇的人性论思想缺乏正确的认识，以致对荀子的人性学说造成了很大的误解。因此，从准确理解《正名》篇性论的基础上起步，会找到一把打开荀子人性之谜的钥匙。

《荀子人性论的再考察》也写于1991年，刊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6期。该文对荀子的人性论进行了考辨，认为荀子性概念的第二层意义是二元的，是由恶的情欲之性和无所谓善恶的知能之性构成的。荀子所谓“人之性恶”指的只是情欲之性这一特殊，而并非具有一般意义。作为涵盖情欲知能的荀子所谓性概念，它的最一般、最基本的内涵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是与“伪”相对的“本始材朴”，指的是人生而就具有的本能。

《思孟五行说新解》也写于1991年，刊于《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该文认为所谓思孟五行说，既非荀子传闻有误，错把邹衍当成了孟轲；也非指的是水火木金土相克相生；也非单纯地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而是指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出于人

性的性善论，荀子从其“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的理论出发，认为“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危害最大。所以视其为“子思、孟轲之罪”，予以了空前激烈的批判。

《荀子认识过程论发微》写于1987年，以笔名都梁仁刊于《湖湘论坛》1989年第2期。该文认为荀子将人类认识的发展大致分为“簿类”、“征知”、“行”、“明”四个具体的阶段，即从感觉的特殊到理性认识的一般，再由理性认识的一般到“行”的特殊，最后又由“行”的特殊到新的理性认识的一般。荀子关于人类认识发展的公式，其实就是“知”、“行”的螺旋型循环，并非简单的“行”高于“知”说。

《荀子“法后王”考辨》写于1991年，刊于《管子学刊》1995年第4期。该文认为“后王”既非“今日之君”，也非虚悬的期待中的王天下者，当然也不应是周文王、周武王，而应是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当今之王以前的周代的贤王。如成王、康王这样的西周盛世之君。荀子提倡“法后王”尽管主观上是为了“法先王”，但客观上将“后王”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将“先王”推到了后台。简单地肯定荀子的“法后王”为社会进化论固然不尽合荀子的本意，简单地将“法后王”与“法先王”等同而看不到其中透露着新思想的因素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只有分别从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两方面去考察，才能正确评价荀子“法后王”的意义。

《论荀子的君民关系说》写于1992年，后刊于《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夏之卷。该文认为从荀子尊君的目的看，从其论道义与君权、民与君的关系看，荀子与孔子、孟子一样，基本上是一个民本论者。将荀子说成是一个“与孔孟有很大不同”的君本论者，实在是对荀子思想不甚了了。

《荀子兵论初探》写于1992年春，后刊于《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该文认为荀子以禁暴除恶为目的的战争观、以壹民附民为本的强兵论，虽然不无创造发展，但从总体看，是对孔子、孟子儒家传统军事思想的继承；他以为将之道、王者之军制为内容的治军术则是他在战国末期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传统军事思想的创新和补充，其中许多见解往往发人之所未发，值得重视。

《荀子与“六经”关系新考》写于1996年春，是本编诸篇中最晚的，刊于《书院研究》第三辑。该文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荀子与六经的关系做了更详尽的考察。认为就群经的流传来说，荀子是孔门的最大功臣。而荀子对群经的理解和称引，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从珞珈山下来到如今，我在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领域里跌跌撞撞，已发表了百多篇论文。近二十年来我由古汉语而中国思想史，再由中国思想史而中国学术史，走的基本是从语言到历史的路子。从方法上讲，主要是从考据求义理。王葆玟先生说我的文章是以汉学的方法得出宋学的结论，庶几近之。我曾说过，我在研究方法上要力求三点：一是从微观入手，探讨学术上的重要问题；二是坚持出土材料和传统文献的互证，不是简单地以出土材料来否定传统文献，而是走以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相互证明的路子，努力以出土材料为突破口来诠释传统文献；三是严守学术规范，不做没有新意的工作，观点和论据都以求新为务，对待别人的工作，都要尽可能地予以尊重。纵观我近二十年来的工作，可以说愈到后来，这一特色愈突出。今后，我还将继续往此努力。

廖名春

2004年10月于北京回龙观新居